

坚定文化自信
弘扬中国精神

捡了故事，丢了历史

——谈谈今天我们如何避免误读历史

□丁晓平

文学创作永远无法回避历史问题。因此,在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盛行的当下,在微观历史、口述史和非虚构写作丰富的今天,我们的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已经呈现了一种“捡了故事(微观的局部的片段或细节),丢了历史(宏观的整体的过程和因果)”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实是我们碰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和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对于写作和阅读,写什么和读什么或许不必操心,因为对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来说,什么都可以读,什么也都可以写,可怎么读、怎么写却是一门学问,这里有情感、有立场、有哲学、有思想,有一点还是必须要有的,那就是还要有科学和理性——既要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

精神有领袖,历史无先知。要做到正确的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或者说如何避免误读历史,笔者结合自己的历史写作和阅读经验,谈一点肤浅的体会,一家之言,抛砖引玉,期待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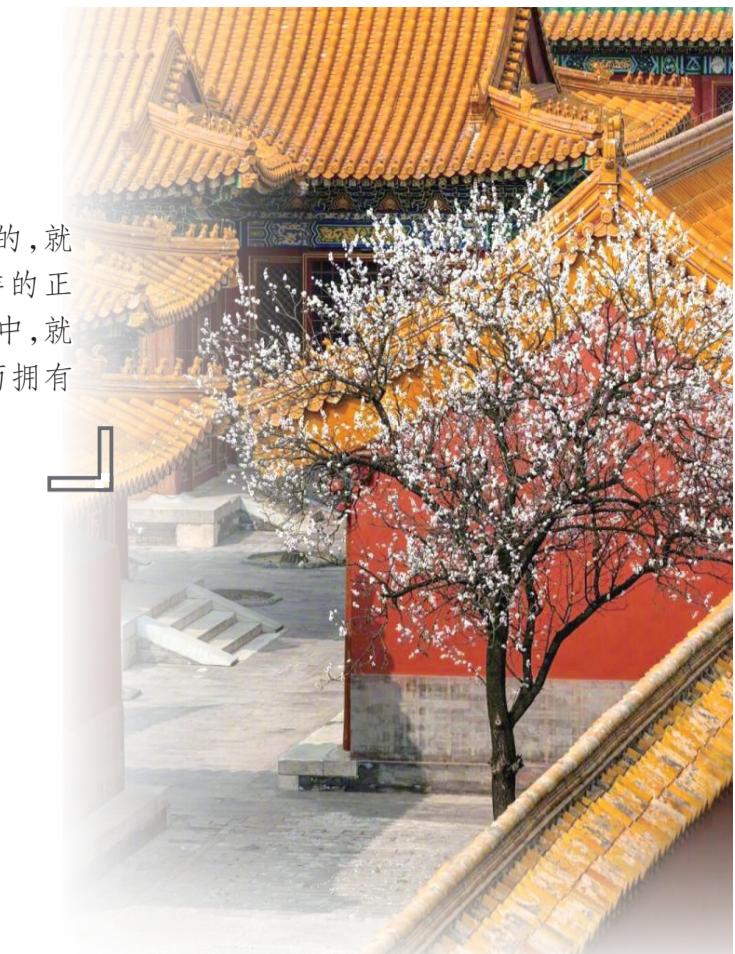
一、不要轻易迷信权威,要有“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怀疑精神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确,历史都是由人来书写的,而且任何时代历史的记录,都深受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当时写作环境、价值观、写作动机、语言习惯和素质水平等因素制约,有好坏之分,有真伪之别,甚至还有故意遮蔽、掩盖历史真相的。因此,读史、写史就必须学会辨史,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不能对某个历史事件、某个历史问题,听了某个所谓权威的一家之言或一部专著,便急急忙忙倾心相信,从而受到蒙蔽,陷入对所谓“历史”的“迷信症”,误入歧途。因此,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必须提高警惕,回到历史的现场,正视历史的局限和局限的历史,辩证分析,不能照单全收,既要在局限的历史中观照过去,也要在历史的局限中展望未来。

当下诸多所谓的网红式的学术权威和大V、公知,他们当中很多人既没有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也缺乏深厚的学术修养,还不愿“坐冷板凳”,是不甘寂寞的“半油婆子”,凭借自己在国家级研究机构、院校、媒体、基金会或其他有经济实力的自媒体平台,以自己不怪则怪的奇谈怪论和牢骚满腹的情绪口水,采取与主流思想绝对对立的碎片化的观点,用自己武断、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泄私愤、发雷音,迎合和媚俗受众的逆反心理,或采取擦边球的形式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甚至诋毁、诬蔑或歪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其真实目的就是以言论、出版自由的幌子煽风点火,企图通过各种新媒体和社交平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和所谓宪政民主,做“和平演变”的奴才。比如,某本以“国家”打头的人文历史杂志在未经笔者允许的情况下曾两次摘转本人著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的内容,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在转载中竟然在本人著作中插入境外出版物的文字,拼凑剪辑,前后观点完全相反,后被举报,不得不公开向社会和本人道歉。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命题。当下,“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中国却被众多的公知们

作为一个作家,我想,我们首先最基本最起码的,就应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正义、自觉、自由和善良,我们在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中,就拥有境界、方法、水平和情怀,就拥有了历史感,从而拥有力量、光明、温暖和希望。



自身知识的局限,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像狗仔队一样抢新闻、找噱头,“追星”般跟风炒作,博取眼球,推波助澜,在舆论上没有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思想与理性是人类天性中最重要的素质,对此我们必须有着坚定的信仰。就像没有思想的历史学家绝对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一样,没有思想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我在著作《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的序言中,对历史写作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历史不是人类的包袱,而是智慧的引擎;历史不是藏着掖着的尾巴,而是耳聪目明的大脑。历史更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在全球正在“化”为一体、微观史独领风骚、史学研究“碎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在史学家和公知们沉溺于对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微观史并自足于津津乐道的今天,在日常生活史、个人口述史、小历史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上出尽风头的今天,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细节片段的微观历史遮蔽了总体全局的宏观历史,混乱、平庸的微观叙事瓦解了宏大叙事,琐碎、局促的微观书写离析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显然,这是当代知识变迁过程中一种错位的“非典型状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历史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的历史,已经说明个体、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点——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离不开宏大叙事,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当中,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整体,在宽容、坦率、真实、正义中正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深度价值和潜在秘密,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径,在常识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才是真正的大历史的视角,从而避免陷入历史的虚无和知识上的尴尬境地。

因此,我始终认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正义比平等更重要。”

历史的苦难造就了苦难的历史。而苦难又是历史送给我们的一个最不受我们欢迎的礼物——是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份礼物。对历史,我们必须深怀敬畏之心,怀抱理性的真诚,珍之惜之。还是那句话: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其实不仅是为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正确的研究和认识历史到底有什么作用?在这里,我想用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四句教”来回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最后,我还是引用作家梁晓声先生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释,与大家一起共勉。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正义,不用提醒的自觉,以限制为前提的自由,替别人着想的善良”(笔者稍为作了一点改动)。作为一个作家,我想,我们首先最基本最起码的,就应该做一个像梁晓声先生所说的这样一个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正义、自觉、自由和善良,我们在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中,就拥有境界、方法、水平和情怀,就拥有了历史感,从而拥有力量、光明、温暖和希望。



杨明义作品《秋夜》局部